



主 编 李景林 李祥俊
执行编辑 田智忠

京师 中国哲学

(第二辑)

《汉书》中所反映的天人协调论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荀子礼学思想研究

理论分疏与发现经典——《十力语要》儒家外王学现代转化思想研究
知北游：文本的意义分析

《辨奸论》真伪辨

中国美学与农耕文明

程颐的历史哲学思想探析

王弼玄学中的庄学精神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京师 中国哲学

(第二卷)

中国哲学史出版社



主 编 李景林 李祥俊
执行编辑 田智忠

京師 中国哲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师中国哲学. 第二辑/李景林, 李祥俊主编.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207 - 09049 - 2

I. 京… II. ①李…②李… III. 哲学—研究—
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7356 号

责任编辑: 孙国志

封面设计: 李 梅

京师中国哲学(第二辑)

Jingshi Zhongguo Zhexue (Dì'èrjì)

主 编 李景林 李祥俊

执行编辑 田智忠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50 000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9049 - 2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编 者 的 话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于去年编订了《京师中国哲学》第一辑,集中反映了我们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研究上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为推动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继续编辑了《京师中国哲学》的第二辑,并希望把这项工作长期做下去。

本辑《京师中国哲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学术前沿”栏目,选刊了10篇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以全面反映本学科在中国哲学科研领域的最新成果;“辅仁国学讲坛”讲座讲稿两篇,反映了我们在最近一年中学术交流的部分情况;“世纪初以来的儒学研究报告”三篇,对本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整体发展、中国哲学明清阶段的最新研究成果、2009年中国哲学的基本发展情况作了综述和说明;第四部分,介绍了与中国哲学相关的一些学生社团及其活动。

本辑《京师中国哲学》的编订,同样得到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及同道学者们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领导及孙国志编辑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学术前沿

《汉书》中所反映的天人协调论	郑万耕(3)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李景林(10)
荀子礼学思想研究	张奇伟(27)
理论分疏与发现经典	
——《十力语要》儒家外王学现代转化思想研究	李祥俊(42)
知北游:文本的意义分析	强 昱(52)
《辨奸论》真伪辨	徐文明(61)
中国美学与农耕文明	刘成纪(83)
程颐的历史哲学思想探析	章伟文(88)
王弼玄学中的庄学精神	蒋丽梅(103)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	田智忠(115)

辅仁国学讲坛

作为“身体符号学”的《周易》	张再林(129)
禅宗的智慧	陈战国(135)

儒学研究报告(2001—2009)

儒学研究报告(2009)	冯前林(147)
本世纪以来儒学研究报告之儒学通论部分	王觅泉(172)
新世纪伊始明清儒学研究	冯前林(219)

学生社团组织

辅仁人文学会简介	(291)
----------------	-------

学术前沿



《汉书》中所反映的天人谐调论

郑万耕

摘要 强调天人谐调构成了《汉书》的一大文化特色。这反映了秦汉以来贯通天人的学术思潮,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的敬畏与自我约束;它昭示人们要效法天地,顺应自然规律,珍爱资源,保护生态;对于统治者来说,则应施仁政,躬节俭,振贫穷,恤孤独,扶助弱势群体。如此方能天下大治,海内安然,真正形成一个和谐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

关键词 汉书 天人谐调 警示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天人合一”,强调“天人和谐”,由此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辩,成一家之言”。班固继承司马迁的优良传统,致命遂志,欲求文章以扬名于后世,所著《汉书》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文化特色。

《汉书·货殖传》篇首的序文,一开始就广泛引述古代经典,宣扬“天人谐调”论: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辨其土地川泽邱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树种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藿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置网不布于壑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溪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茌藁,泽不伐夭,蠃鱼麋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

圣人”，此之谓也。

此论有本于《礼记·王制》、《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礼记·王制》曰：“獾祭鱼然后虞人人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罝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杀胎，不夭夭，不覆巢。”《诗·鱼丽》毛传稍变其文，则云：“太平而后微物众多，取之有时，用之有道，则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风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兽然后杀；獾祭鱼然后渔；鹰隼击然后罝罗设。是以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大夫不麝不卵，士不隐麇，庶人不数罝，罝必四寸，然后入泽梁。故山不童，泽不竭，鸟兽鱼鳖皆得其所然。”所谓“取之有时，用之有道”，也即《货殖传》所说：“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而其主旨都是强调人应与天地相谐调。所以长乐刘氏解《王制》之文曰：“天生万物以时，圣人赞之以德；地生万物以气，圣人赞之以礼。德正于内则时罔不和，礼正于外则气罔不顺。和顺钟于万物，则生成不失其宜；和顺浹于人心，则动用不违于法。此圣王所以尽人之性于上，而尽万物之性于天下也。尧舜禹汤文武之为道，莫不以是先焉，乃能嗣天以仁而使万物各正其性命也。故取之各有其时，则物得以曲遂其生，而材无不成矣；用之各有其制，则民得以礼节其欲，而德罔不砺矣。”（宋卫湜《礼记集说》引）《货殖传》所谓“辨土地川泽原隰之宜，教民树种畜养”，“顺时宣气，蕃阜庶物”，“因其土宜，各任智力”，也正是此意。这与《礼记·月令》“凡举大事，勿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也是一致的。“大数”即天地阴阳的自然法则。延平周氏注《王制》上述之文也说：“獾祭鱼而下主言秋冬，不麝不卵而下主言春夏。若獾祭鱼者，莫非感阴气之肃杀；若麝与卵者，莫非感阳气之发生。先王辅相天地而育万物有道也。”（卫湜《礼记集说》引）“辅相天地”本于《周易·象传》文。这说明，《易传》“辅相天地”与《王制》上述之文是契合相通，相互发明的。据此而言，《汉书》多引《易传》文作为其天人谐调论的立论根据，也就不足为奇了。

《货殖传》此文三引《易传》文。“上下序而民志定”原于履卦《象传》：“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是讲社会的和谐有序，人人各得其所，各畅其志。“故《易》曰”两句，引自泰卦《象传》与《系辞传》。泰卦《象传》云：“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指圣人；“财”通裁，“裁成”即加以裁制完成；“辅相”即遵循固有的规律而加以辅助。“裁成辅相”就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物的变化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生活的需要，也即“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而不是破坏自然物和自然界的秩序。所以说：“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因其土宜，各任智力”。这是一种典型的天人谐调论。

此种观念在《汉书·律历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说：

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桷之于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含阳之施，桷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疑为九二之误），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谓矣，是为三统。

此段文字，以黄钟为天统，林钟为地统，太族为人统，并配以乾坤两卦象，加以解说，本是要以此说明律管的长度。其以十一月配乾之初九，六月配坤之初六，正月配乾之九三（九二），是卦气说的一种形式，以此说明阴阳二气的消长和一年四时的变化。但也清晰地表明，天、地、人乃一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人应该顺天地，类万物，“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成就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也即儒家所说的“人与天地参”。所以《律历志》又说：“人者，继天顺地，序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义极天地之变，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六百四十分，以应六十四卦，太族之实也。《书》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则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象也。”天兼地，人则天，继天顺地，序气成物，以终天地之功，也同样是讲人与天地相谐调。

《汉书·律历志》又引刘歆《三统历谱》说：“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礼。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所谓“列人事以因天时”，“顺乎天而应乎人”，“治历明时以和人道”，都是强调天人和諧。

据《汉书·魏相传》记载，魏相上书汉宣帝曰：

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

此文与上述《律历志》文一样，天地人统而论之，从天地、日月、四时、阴阳，讲到明王贤圣，视其为相互联系的整体，也以卦气说解释阴阳二气的消长、日月的运行、四时的变化，但其重心却更加强调“圣王以顺动”。“顺动”即顺天地而行动，也就是所谓“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乘四时，节授民事”，“动静以道，奉顺阴阳”。惟其如此，方可达至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灾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礼让可兴。总之一句话：天人和洽，天下太平。

所以，《汉书·公孙弘传》更将此种和谐的价值理想推崇到了极致：“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本于《文言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先天”，是说先于天时到来而行事，即能预测天时的变化，为天时变化之前导。对自然加以开发引导，而自然的变化亦加以顺从，此即“先天而天弗违”。所谓“后天”，是说天时既已到来之后，又注意适应，因顺自然，应而随之，此即“后天而奉天时”。这就是“与天地合其德”。这与“裁成辅相”说一样，也是讲天人谐调论。如此，君臣和，百姓和，心和，气和，阴阳和，天人和，故云“和之至也”，“和之极也”。“和之

至”也即《易传》所说的“太和”，即最高的和谐状态。其实，《汉书》中到处可见的“顺天应人（民）”，也无非是要表达天人和谐的意蕴。

《汉书》极力宣扬天人谐调的理念，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警示意义，对当世与后人也有深刻影响。其一，它充分反映了秦汉以来贯通天人的学术思潮。《吕氏春秋》“法天地”，“顺四时”，“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企图建立一个贯通天人的思想体系。它以十二纪为纲，搭了一个架子，以每纪的纪首记述当月的季节、气数、天象、物候、农事、政令、宗教祭祀等等，并按照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特点，将四组论文配属四季之下，讲述人文生活与政治活动。汉人所推崇的《礼记·月令》与此大致相类。汉朝初年，陆贾为刘邦陈述治国的长久之术，著《新语》，其首篇《道基》第一句话就说：“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认为圣人的功能与天地相参，方称得上道术。也就是说，贯通天人乃治国道术的基础。著名思想家董仲舒在与汉武帝对策时也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是“观天人相与之际”，并吸取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以阴阳在四时四方中的运行言天道，又将此天道贯彻于人生政治社会的全部生活之中，以建立天人贯通的庞大思想体系。几乎与此同时，淮南王刘安则完全接受了阴阳五行为骨架的世界图式，而又加以发展，同样是企图建立一个贯通天人的自然哲学系统。西汉后期，扬雄模仿《周易》创作《太玄》，用八十一个符号构造了一个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的世界图式，天道、地道、人道，无所不备，并以阴阳二气的消长运行说明天道与人事，为汉易卦气说提供理论上的论证，也是一个贯通天人、包含万类的系统。班固推崇陆贾、董生、扬雄，以为他们都“用纳乎圣听，列炳于后人”（《汉书·叙传》）。其天人谐调论正是此种贯通天人的学术大势的集中反映。

其二，它充分体现了古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自我约束。上述所谓“谨于尊天”，“不得”如何如何，即是此意。《汉书·李寻传》载李寻劝说王根也曰：“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祸福。举错悖逆，咎败将至，征兆为之先见。明君恐惧修正，侧身博问，转祸为福，不可救者，即蓄备以待之，故社稷亡忧。”“恐惧修省”也即对天地心怀敬畏与尊重。有敬畏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所以《李寻传》又说：“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桴鼓之相应也。”“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就是敬畏天地；“顺之以善政”，顾之以“时禁”，“时止则止，时行则

行”,就是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不可任意破坏自然。

其三,人类应效法天地,顺应自然规律。所谓“与天地合其德”,“顺天地,类万物”,“动静以道,奉顺阴阳”,“顺时宣气”,“裁成辅相天地之宜”,无一不是对此种观念的反复强调。按照中国传统的天人学说,以为人受天地之气以生,是天地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必须遵循天地变化的法则,效法天地,以成就其化育万物之功。此种观念在《汉书》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如其《礼乐志》所说:“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礼乐制度是象事天地而制定的,刑法制度也同样如此。“圣人既躬明愍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这里强调“则天”、“类天”、“效天”、“因天”,也无非是说,人类应效法天地,遵循自然规律。所以《汉书》又多言“顺天”,即使皇帝的诏书也特别强调“务顺四时月令”(《成帝纪》)。这也就是《管子·四时篇》所说的“时则必顺天之所以来”,“五政循时”。《礼记·月令》所谓“凡举大事,勿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

其四,要珍爱资源,保护生态。上文所说“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取之有时,用之有道”,“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网罟不布于壑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溪隧”,充分体现了古人珍爱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心态。“用之有节”,“用之有道”,是强调资源的合理利用;“山不茌蘖,泽不伐夭,蜃鱼麋卵,咸有常禁”,是强调维护生态。

斧斤不入,林木方能茂密;网罟不布,鱼鳖方能肥壮;矰弋不施,鸟兽皆得繁殖成长。惟其如此,方能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方能得到持久的发展,国家方能安定而有序,也即其所谓“上下序而民志定”。不仅要合理利用资源,还要节约资源,所谓“躬节俭,减后宫之费,损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此乃“治乱之道,存亡之端”(《东方朔传》),实圣贤明王之所必务。

其五,要施行仁政,扶助弱势群体。这是天人协调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天地之大德曰生”,使万物生生不息是天地之仁德;人类效法天地,辅助天地成就化育万物之功,使人人各遂其生,各畅其志,就君王或统治者来说,就是要施行仁政。汉文帝曾下诏书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鰥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

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文帝纪》)振贷鰥寡孤独穷困之人,存问长老,即关爱、扶助弱势群体。《元帝纪》亦云:“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鰥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瘳无忧矣。”又曰:“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东方朔传》则更为明确地说:“于是(吴王)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材,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节俭,减后宫之费,损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以予贫民无产业者;开内臧,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畜积有余,囹圄空虚;凤皇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远方异俗之人乡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臣愚窃以为过。”只有布德惠,施仁义,躬节俭,去侈靡,薄赋敛,省刑辟,振贫穷,恤孤独,扶持贫民无产业者,方能天下大治,海内安然,真正形成一个和谐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只是十分可惜,君人者都不肯这样做。东方朔的这一提醒,真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颇具警示意义。

以上所列,粗略论述了《汉书》中所反映的天人谐调论及其启示。仔细体味个中意蕴,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似乎也不无借鉴意义。这份文化遗产,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李景林

提要 文章通过分析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了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这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教化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汇融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关键词 儒学 教化 文化意识 现实载体 民间儒学 文脉 血脉
顺取逆守

一、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意识的反思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的发展变化来得非常突然。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中国人的文化意识还是完全沉浸在文化激进主义或是说反传统的状况下,这个状况已经延续了近百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余英时先生发表过一篇文章,叫《现代儒学的困境》,大概发表于1988年。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我国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他对现代儒学的困境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儒学已经失去了它

^{*} 本文是作者2008年5月1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讲演的录音整理稿,其删节稿曾刊载于《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